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英〕理查德·H. 托尼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英] 理查德·H. 托尼 著

沈汉 等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英)理查德·H. 托尼著;
沈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4952-5

I. ①宗… II. ①理…②沈… III. ①宗教—影响—
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102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英] 理查德·H. 托尼 著

沈 汉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52-5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6.00元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 the Estate of R. H. Tawney. 1926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1980.

根据英国企鹅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80 年版译出

译 序

理查德·亨利·托尼(R. H. Tawney, 1880—1962年)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的社会思想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于1880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其父是东方学者,曾在印度教育处任职。托尼先是在格拉比学校就学,后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参军。托尼在其社会活动初期,在兰开郡和北斯塔福德郡担任工人教育协会的指导教师,以后担任了16年之久的工人教育协会主席。这个协会积极推动成年工人教育运动。托尼这段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思想和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他参加过教育部评议委员会、伦敦郡教育委员会及大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他自1921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这里成为他终生学术活动的根据地。在1931年至1949他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1949年以后为荣誉教授。托尼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是一位社会哲学家。他在学术研究中注意社会问题,认为通过讲授经济史可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思想和生活方式加以抵制。他积极参加英国工党的工作,是工党左翼活动家,曾任工党教育政策顾问达50年。托尼的著作除这本《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外,还有《16世纪农业问题》、《贪婪的社会》、《教育:社会主义政策》、《平等》、《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商业和政

治》、论文“1558至1640年乡绅的兴起”(载《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41年)等,另与布兰德和布朗合编《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与伊林·鲍尔合编3卷本《都铎朝的经济文献》等。

《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一书是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历史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它最初是托尼在伦敦英王学院作讲座的讲稿,1926年结集成书出版。有关情况原书的几种序言中已提到。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曾在本世纪初年形成一个学术焦点。德国学者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在1904和1905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以后,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写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1916)一书,对韦伯的观点提出批评。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正是为了阐述与韦伯不同的看法而写作的。托尼认为,韦伯在其著作中强调加尔文教、特别是英国的清教在建立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成长的道德和政治环境中起了占压倒地位的积极作用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强调得太过分了。托尼赞成布伦塔诺的某些批评意见,他指出,第一,在15世纪,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各地均有所表现,如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德意志南部和佛兰德。至于16世纪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它们是新教国家,还因为新大陆发现引发的大规模经济运动;第二,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与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思想运动时只注意到宗教思想,其实,诸如文艺复兴时期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实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关于货币、价格和外汇的思想,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包括英国清教在内的加尔文派的教义内容纷杂,有些内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无论是“新教伦理”

还是“资本主义精神”都比韦伯书中所说的要复杂得多，韦伯把加尔文主义过于简单化了。托尼在本书中阐述的看法对于中国学界全面认识当时西方讨论资本主义思想起源的情况会有帮助。

本书内容涉及宗教史和中世纪社会思想史诸多方面，我们相关知识有限，加上原书旁征博引，我们的译文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望读者教正。

本书中译稿由沈汉（1937年版序、卷首语、前言、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索引）、徐祥生（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二、三节）、许洁明（第二章第三节）、孙庆（第二章第二节、第五章）、李海东（第四章第四节）译出，注释由沈汉、梁远、袁梨梨译出，沈汉对译文作了校订。

沈汉

献给查尔斯·戈尔博士
以示爱戴和感激之情

无论世人怎么认为，那些在上帝、人类精神和至善面前不做反省的人，或许可以成为成功的小人，但毋庸置疑只会成为一个拙劣的爱国者和拙劣的政治家。

贝克莱主教

《锡里斯》，350 年

目 录

1937 年版序	1
卷首语	9
前言	11
第一章 中世纪背景	13
一、社会组织	23
二、贪婪之罪	44
三、理想和现实	61
第二章 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派	69
一、经济革命	70
二、路德	82
三、加尔文	102
第三章 英国国教	131
一、土地问题	133
二、宗教理论和社会政策	145
三、个人主义的成长	167
第四章 清教徒运动	184
一、清教和社会	185

二、神圣的宗规与贸易的宗教	198
三、经济美德的胜利	212
四、消除贫穷的新良药	234
第五章 结束语	253
注释	263
索引	318

1937 年版序

vii

自从本书十年前问世以来，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与日俱增。特勒尔奇那部有极好导论的从社会结果对宗教思想作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现在已有英文译本可供阅读了，韦伯的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这样。我的著作忽略了对宗教改革后天主教观念的论述是一个严重的缺点，随后的作者已做了一些工作来弥补它。这些著作论及中世纪意大利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德时代德国社会力量的作用及路德对它的态度；加尔文的经济原则；耶稣会士关于高利贷和联系主题的教旨；王位中断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同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宗教和社会见地；贵格会、卫斯理派和英国其他非国教派团体对他们在 18 世纪遇到的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的态度。在关于这些和类似主题的多少有些冗长的论著目录中，已故的塞教授、M. 哈尔布瓦克斯和帕森斯先生撰写的论著，和戈登·沃克先生刚刚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值得注意。^①

如果说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仍然很复杂，那末，你会看到，它们不会使你不感兴趣。如果说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的话，那么从讨论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最重要的是自明之理。当本书刚问世时，一位为严肃杂志撰

稿的善意的评论家可能会极为严肃地反对在史学著作中使用“资本主义”这样的政治流行语,对这一误入歧途的作者表现出一种有害的倾向。这种无知荒谬的现象在今天恐怕不大容易发生。“资本主义”一词像“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一样,显然很容易被滥用。显而易见,现在到了更重要的、限定资本主义不同形式的前后相继的成长阶段,而不是继续详细论述其存在种类的时候。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半打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学者意欲否认这一特定事实的存在;或者认为,如果它确实存在,则是对人类不适合的制度,像梅尔希策德克所说,它是无始无终的;或者说是在暗示,如果它经过历史发展的话,则要适当地阻止把它揭露出来;他们固执地把眼睛蒙上。文字争论是无益的;如果一个作者发现了一个更合适的词汇,他务必要使用它。他在理解过去三个世纪的欧洲历史时,无论如何不像是要在避开术语之余无视事实。

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普遍实现已由第二次变革完成了,如果说它很平常的话,恐怕也很有意义。当“贸易是一种事业,宗教是另一种事业”的观点作为一种大胆的新奇之物被倡导,认为宗教和经济利益形成两个分离但相互协调的领域,它们中不会有哪一方侵犯另一方的信条便为 19 世纪的英国以一种它早期的拥护者可能感到为难的无条件的自信普遍地接受。历史学家不那么关心对一种观点正确性的评价,而比较注意弄清楚它的发展。这里无须对这种合宜的界限产生的作用,以及在我们当时造成界限的变动孰好孰坏展开讨论。无论它有多少优点,它取得胜利和它现在得以成为现实,都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实现的。经院哲学家深奥的经

济理论,左翼宗教改革派对高利贷、霸占土地和敲诈性价格的严厉谴责;精明的都铎政治家求助于传统的宗教惩罚,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为建立一种比他们所推翻的更加严厉的经济戒律的努力,这些在实践中收效甚微,却是思想史极好的证据。所有认为财产制度、市场交易、整个社会结构和它活动的全部范围不是根据绝对的财产所有权而存在,而必须在受公开宗教审判时为它们自己辩护的看法,只是依赖于假定。所有人都坚决认为,基督教信仰并不比不加约束的放纵的贪得无厌,即对财富无止境的欲望(*appetitus divitiarum infinitus*)有更多致命的敌人。因此,宗教不应当再控制实业的要求一经系统地表述出来,就遇到不仅表现在文学和教育之中,而且表现在习惯和法律中的众多原则的反对。它只是逐渐通过不限于理论的冲突,才促使从一种令人讨厌的自相矛盾状态向毫无异议的真理的转变。

对于这种转变的倾向已不再争论。但它的原因和发展的阶段仍然是争论的问题。特别在英国,决定性的阶段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两个世纪。因此,晚近绝大多数有关本书论及主题的著作自然也就集中于那个使人心烦意乱的时期。随后发生了提出一种有关社会问题的宗教思想运动的理论的极引人注目的尝试,它以本世纪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和190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为肇端。从此以后,许多同类的著作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很自然地一直都以马克斯·韦伯为出发点。

严格说来,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尽管不是所有谈论他的评论家都提到它。他准备对不同宗教的社会观和影响作比较研究,未完成的成果是1920年问世的3卷

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全集》。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完成更宏伟著作的第一步，随后对它加以调整和扩充，构成了《宗教社会学论文全集》第一卷的一部分。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作为宗教改革结果而获得其独立生命力的某些特殊的变种，始终比其它的某些伟大教义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文章是检验这种概括的一种尝试。

在后来为《宗教社会学》撰写的导言中，韦伯阐明了它们的范围。他的目的是研究使英国人沮丧的抽象观念的衰退，研究“某种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制度的风尚 (*ethos*) 或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他希望通过神圣的质朴 (*O sancta simplicitas*) 即通过某种严格限制来避免对其论题的曲解。他没有系统地陈述任何“教义”；相反，他强调应当把他的文章看作一种纯粹的准备工作的 (*Vorarbeit*)³，即属于一种做准备工作的随笔。他并没有试图说明“精神对经济事件的决定作用”，⁴ 相反，他坚持“经济事实最为重要”的观点⁵。他甚至在讨论宗教看法的文章中，都没有表示要做一种全面的解释；相反，他竭力主张有必要考察这种看法本身是怎样“反过来被它自己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特点，特别是经济事实所影响”。⁶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决不想“在解释文明史时用片面的精神和解释代替同样片面的‘物质主义的’解释”，⁷ 他明确地否定了任何这一类的意向。

鉴于这些否认，恐怕已经没有必要再指出，韦伯在这些论文中并没有试图提炼一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全面理论。在马克思展开这场辩论以后，在德国对这个题目已有很多的讨论，晚近关于这个主题分量最重的著作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两

年前出版了。韦伯所感兴趣的并为他理智的眼光掠过的领域，毫无疑问异乎寻常的广泛。但是，他早期的著作一直是关于经济史方面的，并且直至 1920 年去世，他一直在就这个题目开讲座。如果说他没有在他的论文中谈及美洲发现的经济结果、货币大贬值、安特卫普天主教城市金融业引人注目的兴起，那么并不是说这些羞怯的事件终于碰到了它们可以不为之注意的历史学家。显而易见，它们是划时代的事件；显而易见，它们不仅对经济组织而且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无论如何，韦伯当时的问题是不同的问题。孟德斯鸠恐怕是以过度的乐观评论说，英国人“已经在爱国、商业和自由这三件重要事情上走在所有民族之先”。在这些赞许中，第三点对第一点的有益作用常常被人们强调。韦伯诘问道，难道第二点也可以从中部分得益吗？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从始终以加尔文为杰出人物的宗教运动的影响中可以找到这种起连接作用的环节。

由于韦伯的论文现在有了英文版，这就无需扼要叙述他论述的步骤。如果我能提及它们而又不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我把自己对它的看法粗略地写在眼下这部著作第一版的一个注释中，它太长了，因此无法在这里复述一遍。以后，他在 1930 年发表的论文的英译本序言中再次充分地对它加以陈述。⁸ 韦伯的概括在本书问世 20 多年前的时间里为欧洲大陆学者广泛地讨论。因此，包含在它之中的批评决不能说是具有独创性的——除非真的不是那末急切地去驳倒作者，而是更多地从它本来的意思去理解他。

其中的第一点——“16 世纪和 17 世纪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由于它们是新教徒掌权这一事实，而是大规模的经济

运动,特别是美洲的发现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在那以后已经由 xi 罗伯逊先生相当详尽地发展了,但是它恐怕还不十分精确。当然,韦伯恐怕会回答说,这种论点虽然正确,就其论文对问题的讨论来看,却是用隔靴搔痒的手法来驳斥对方(*ignoratio elenchi*)。他恐怕会说,为了公正地认识他,人们应当根据他自己的见地去认识他,而现在不要从一般经济史来认识他,而要根据他关于社会问题的宗教观去认识他。我的第二点评论已由布伦塔诺提出过了,即应当给予文艺复兴的政治思想以更多的重视,韦伯已预先讨论过这个问题,⁹我则忽略了他这方面的意见,对此我表示抱歉。仅就与过去的批评有关的他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最严重的缺点而论,并不是人们一向极为强调的那些东西。加尔文派运用的“天职”学说无疑是有其意义;但是,它们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及它们与同一观念的其它说法之间的相似或差异,则属于个人判断的问题,并没有经过精确的验证。韦伯和批评他的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正像我自己做的那样。不管怎样,他对于加尔文派社会理论的解释如果说完全勾勒出了某些需要强调的要点的话,那末也留下大量未说明之处。这里无法就他论证中的缺陷(*lacunae*)加以讨论,但是它们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尽管晚近有些人在当时天主教作家那里找出相似理论的尝试一直未能如愿,韦伯则倾向于视之为比它好得多的东西。¹⁰更重要的是,他夸大了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这个运动某些较晚的阶段,他可以找到大量证据,但他并没有充分强调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死后的一个世纪中经历的深刻变化。

最后一点具有某种重要性。它暗示,韦伯所讨论的问题需要